

一个美国专家对刘邓路线的控诉

——寒春同志在揭发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发言(全文)

1949—1959延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时期：

政治待遇：在这十年间中国普通干部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同中国的干部一道参加我们工作单位的群众运动，包括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反右运动。我们参加了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一般干部的政治学习及批评和自我批评。

生活条件：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同志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特权，然而党和我们一起工作最艰苦生活在一起的干部和工人，农民真是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温暖。我们的生活标准在这个阶段同中国干部一样，即首先是供给制，然后是包干制——供给加上另用钱——然后是工资制，我们同工按中国的级别计算，但比同级中国同志多些。旅行在初期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后来旅行需向公安部领取长途旅行证书。

孩子：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待遇完全一样，毫无二样。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在任何地方碰到中国同志、工人和农民毫无例外地都同我们打成一片。他们把美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区别开来。他们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国籍，而是看他对待革命和群众的立场。他们从来都认为我们参加中国革命，他们在中国对世界革命所能做的最大贡献，而且认为在中国对世界革命任任何一方的革命所能做的最好的准备。

我们是这个国家来到中国的，满脑子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所报的科学训练，我不知道我们的思想有什么可以改造的，特别是当我们只读了美国主义，并且参加了中国革命。对我们来说，这十年是我参加伟大革命的十年，是我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十年。这是和我的十年工作的中国革命人民，既有干部、工人、农民耐心地帮助我的十年，带着真挚的国际主义观念和世界的责任感，他们耐心地帮助我们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

一句话，这十年是我加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十年。

1959—1966逐步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占据的时期：

生活条件：1959年开始为我们建造新的宽敞的房子，当我们反对搬进去住的时候，党委书记就说我们应当搬进去住，我们当时相信党，所以如果党让我们这样做，这一定是好的。要我们搬进去住的理由是：如果外国人到我们农场来看我们这些旧的生活条件会给他们造成坏的印象。

在困难的几年里，我们开始有了一整套的特权。首先强调我们应当多吃点肉，停止到食堂去用饭，我们的粮食没有定量。在1962年春天我们得到了特殊的肉食供应和其他东西大量供应。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首先感觉到我们同中国同志特别同中国工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政治待遇：政治待遇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1966年5月离开农场之前，我们仍然参加政治学习，而由于全部活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政治学习感到年年没有新意了。

我们完全排挤在全国规定的学习毛泽东著作之外，大概因为毛主席制定的廿三条规定我们得学缘故，相应收回任何外国人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

旅行、旅行要愈来愈受限制，最后划为一点西安钟楼为中心的十里宽的圆圈，外国人不得超越这个圆圈之外。我们住在这个圆圈之外，我们受到的限制比其他人稍微少一些，但是即使我们想骑自行车做短途旅行也得向公安局申请批准。一般说来拒绝发给签证，有一次1963年我在北京，为了得到签证到附近一个牛场挑选一头分配给我们农场的荷兰牛，我不得不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多星期。

孩子被排挤出少先队之外，这样使他们流露出漠不关心的情绪，损害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这几年里我们和中国同志之间逐渐分隔开来。中国同志越来越卷入阶级斗争中去，而我们被排挤出外边，不能容忍的情况逐渐发展起来，到最后，我们除了工作和天气之外，就几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跟别人谈了。

我们成了几乎被别人排挤出既有政治生活之外，技术工作人员，许多阶级礼貌逐渐代替了革命同志式的批评。

1963年我来北京时，我的外国朋友的情况使我感到吃惊。虽然我们的情况已经糟糕了，然而他们的情绪比我们还要糟糕得多。一方面，他们完全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生活，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接触，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上升。他们被要求住在华丽的房屋里，穿着漂亮的衣服，而且穿着外国式样衣服，以便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他们许多人感到非常不快乐。曾我问一位当水派（不是专家局的人），为什么外国人系统地被派到修正主义一边去，他回答说，既有外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生活，因此他们是平等的，有些单位贯彻这项政策比其它单位贯彻得好些，至于高平生活，那是需要的，这个问很复杂。

这一时期史克进医院诊断，长期地低烧发烧，发现她需要动手术。外语学院一位认识史克已经14年的当权派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她打电话问她的情况，当时史克虽然无法把每件事情都介绍清楚，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地介绍了她的病情，当她去医院返院后，他亲自拜访她，说：“不要再给我写信了”，想去看她，怕得到外国人的信件。粉碎刘邓大军，毛主席万岁！

到这一时期表示危殆的时候，我发现阅读毛主席著作越来越困难了，不照着这样著作去做，我怎能读好这些著作呢？由于党，由于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一方面，我们表示人民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毛泽东要求的那种人。

革命同志。

我们 能理解二者之间为什么会有矛盾。那时候我们想，这矛盾完全是我们头脑中的矛盾，那就是缺乏知识，缺乏理论。我补充一句，在农场里的许多同志同我们一样感到苦恼，他们和我们谈话时，眼里都充满了眼泪。

1966.5 — 1966.9 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控制的时期

1966年5月我们调到北京来工作，当我们到农场时，我们被御挤出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之外，但仍继续参加斗争和科学实验。搬到北京后，我被排除在三大运动之外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

政治待遇：突然间把我当作资产阶级老爷对待了。剥夺了我们甚至同中国同志一起进行政治学习的权利。参加斗争的再政治出治教育政治出治代替了——那就是偏听所到的“内部”政治报告。

生活条件：在运动工作期间，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起见，不应该住到友谊宾馆来。到达北京后，由于安全理由，很难找到一个地方给我们住，于是把我们安置在新桥饭店，是租来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和贸易代表在一起。我们在那儿是从5月15日住到5月29日。这时我们自愿搬出饭店，当时小孩的情况已到了危险关头，不可能再住下去了。

由于这一时期我们曾以安全为借口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得不到任何地方去。由于安全被迫过着这种坐落不动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很弱，并推翻了，为了抵制这种情况的发生，每晚睡觉前我们洗个热水澡。

我们曾提出过，但这一次之。只经过最大努力之后，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只经过最大努力之后，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曾提出过，但这一次之。只经过最大努力之后，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只经过最大努力之后，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曾提出过，但这一次之。只经过最大努力之后，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只经过最大努力之后，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